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宋福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一系列重要论述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

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就是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把严的要求贯穿管党治党全过程，并根据形势任务发展变化不断完善治理方式。这里强调的“持之以恒”，既要求战略方向、政治标准和严的基调一以贯之，又要求治理机制常态运行、政治责任持续落实。这不但是管党治党的实践要求，而且体现长期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规律。必须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局面。

从重大时代课题看战略定位

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问题。“长期执政”不是党的建设的一般性背景，也并非单纯对执政时间长度的事实性描述，而是内蕴着一系列重大党建问题。马克思主义政党不仅要回答好怎样取得和巩固执政地位的问题，更要回答好如何在长期执政过程中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得到人民衷心拥护、具备强大领导能力的问题。正是在系统回答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使之成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战略方针。

我们党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意义及其长期性要求。全面从严治党是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内在要求，贯穿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实践的全过程。既着眼于解决影响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突出问题，又着眼于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长期执政能力，既具有管党治党的现实功能，又具有巩固执政基础、保证使命实现的战略功能。

全面从严治党必须着眼于把提高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密切党群干群关系贯通起

来，使党的建设始终适应长期执政要求。党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能力、组织体系和精神状态也必须与时俱进。我们党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通过解决自身问题、提高党的建设质量，使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优势不断转化为治理效能。

全面从严治党内蕴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和推动党的事业发展。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规定其根本指向，党的初心和使命规定其价值追求，党的建设总体布局规定其基本内容，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规定其治理方式，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为其提供组织保障。只有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放到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中认识，才能把握其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战略方针的全局性意义。

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持之以恒。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的重大课题，全面从严治党不能因为取得阶段性成果而有所松懈。我们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不是说要重点解决的具体问题和管党治党方式永远不变，而是说长期执政条件下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规范权力运行、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增强领导能力，是必须持续回答并不断解决的课题。

从长期执政规律看持续性要求

长期执政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面临的重大课题，必须深化对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规律性认识。一方面，长期执政使党能够连续推进伟大事业，积累制度优势、组织优势和治理经验；另一方面，执政环境和使命任务不断发展，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将长期存在，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消极腐败危险将长期存在。优势能够积累，风险同样可能累积。党的性质、使命需要始终坚守，权力运行需要持续规范，这决定了管党治党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从这个意义上看，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是对管党治党措施的简单重复，而是在保持方向不变、标准不降、力度不减的同时，针对风险变化持续调整治理重点、完善制度机制。

一是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必须在长期实践中保持和发展。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但不会因为党已经取得历史性成就、积累丰富治国理政经验就自然地保持。过去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一时纯洁不等于永远纯洁，已经形成的发展优势也不会自然地延续。执政时间越长，越要警惕理想信念弱化、奋斗精神衰退、制度执行松懈等问题。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只有在持续解决自身问题、不断回应时代要求中，才能得到保持和发展。只有把严的要求贯穿

管党治党全过程，持续推进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和蓬勃生机。

二是长期执政要求持续规范和监督权力运行。我们党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一项重要任务。权力运行始终存在失范乃至被滥用、被异化的可能。执政时间越长，组织规模越大，管党治党任务就越重，越需要警惕权力运行失范、监督效能衰减等一系列问题。例如，腐败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作风问题亦具有变异性、隐蔽性。因此，既要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又要通过常态化监督压缩问题滋生的空间，还要完善规范权力运行的相关制度，使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受到严格规范和监督，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

三是不断发展的历史使命要求党的领导能力持续提升。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我们党长期执政，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形势和任务不断发展，必然对党的领导能力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不会随着执政时间增加而自然增强，唯有根据事业发展的新任务新要求，持续强化理论武装，加强实践锻炼，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和履职本领，才能使党的领导能力始终同使命任务要求相适应。从这个角度看，全面从严治党既是解决党自身问题的过程，也是提高领导能力、增强创造活力的过程。

四是党独有难题要求党持续增强自我更新能力。大党之大，首先意味着体量大，党员数量众多、组织体系庞大、社会影响广泛而深刻，同时也意味着统一思想和行动难度大、组织管理链条长、面临的各种难题多。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的精神状态，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这些都是党独有难题，集中反映了长期执政条件下保持组织活力和自我纠错能力的要求。党的建设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只有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不松劲、不停滞，才能防止组织僵化、精神懈怠和能力衰退，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新的实践中不断得到体现。

从管党治党实践看实现路径

9月2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重要部署，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

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将这一系列重要部署落到实处，必须锚定目标，坚持政治原则，在长期坚持中优化制度机制，使党始终保持应有的政治本色、组织力量和领导能力。

第一，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是全面从严治党的目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党的建设根本原则；“两个维护”是党的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这决定了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持续谋划、部署、推进，保证管党治党的战略连续性，防止因形势变化、任务调整而出现松懈和反复。要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贯穿管党治党全过程，把党中央战略部署落实到党的建设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

第二，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初心和使命集中体现党的性质宗旨和价值追求。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归根到底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越是长期执政，越要回答好为谁执政、靠谁执政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越不能忘记党的初心使命。必须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建设永恒课题，使全面从严治党在长期坚持中始终不偏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站稳人民立场，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持续纠治损害群众利益、侵蚀党的执政基础等突出问题，自觉接受人民批评和监督，以经常性检视校正偏差，使全面从严治党始终具有清晰的价值坐标。

第三，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长期执政要求我们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并且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必须以政治建设统领方向，以思想建设凝心铸魂，以组织建设强基固本，以作风建设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以纪律建设规范行为，以制度建设巩固成果，以反腐败斗争清除消极因素。在此过程中，必须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穿党的建设各方面各环节，使党的各方面建设始终在统一政治方向下协调推进、持续深化。

第四，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为依托，不断增强管党治党的系统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党长期执政的国内国际环境不断变化，管党治党面对的问题也会随之变化。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就是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健全固本培元、凝心铸魂的教育体系，健全精准发力、标本兼治的监管体系，健全科学完备、有效管用的制度体系，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坚持内容上全涵盖、对象上全

覆盖、责任上全链条、制度上全贯通。面对老问题反弹、新问题出现、存量问题隐形变异等，既要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又要推进系统治理、守正创新。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既解决突出问题，又持续查找思想根源、制度漏洞和治理短板；既管住“关键少数”，又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落实到每个党组织和每名党员，把阶段性成果转化为常态长效治理效能。

长期执政并不意味着党的建设可以一劳永逸，而是对保持党的本质本色、规范权力运行、增强领导能力不断提出新的更高要求。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长期性战略与阶段性治理贯通起来、把集中整治与常态治理结合起来，把具体问题治理与体系建设统一起来，不断增强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新征程上面对不断变化的执政环境、使命任务和风险挑战，只有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并不断提高管党治党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才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必须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习近平总书记2025年10月23日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习近平总书记202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重点提升前沿技术战略预判能力

吴 滨

要科学论证技术路线。重点是提升前沿技术战略预判能力，加强多元技术路线探索并及时动态调整。要把握发展节奏。综合考虑国家战略需求、技术成熟程度、要素支撑条件等因素，把需要和可能统一起来，分门别类制定实施规划，做到先易后难、由近及远，积极稳步推进。

——习近平总书记2026年1月30日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强化战略前沿领域科技布局、加强前沿技术预测预见尤为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未来产业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需要科学谋划、全局统筹”“重点是提升前沿技术战略预判能力，加强多元技术路线探索并及时动态调整”。这就要求我们既要看清前沿技术可能向哪个方向发展，又要把握技术多路径演进规律，着力提升对前沿技术的战略预判能力，在方向选择、资源配置和政策支持上提高科学性、有效性。

深刻理解战略预判的要义

科学发现提供新原理、揭示新规律，技术创新则需要把科学发现转化为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具体方案。当同一种科学原理进入工程实现阶段，由于受到材料、工艺、成本、基础设施以及使用环境等各种条件约束，可能形成不同的技术方案，而同一种产业需求也可能由不同技术组合加以满足。这种从科学原理到技术方案的分化，是前沿技术发展

通常呈现为多路线探索、演进的重要原因。

技术演进并非简单的直线过程。一般来说，技术生命周期表现为这样一个过程，即技术在发展初期，性能改善较慢，随着知识积累和工程经验增加，技术性能进入较快提升阶段，而接近既有技术边界后，其改进空间又会逐步收窄。在此过程中，新的科学原理、材料工艺以及系统架构都有可能打开新的技术空间，这使得原有技术轨道出现分岔。因而，技术进步既表现为沿着既定轨道的持续改进，也包括不同技术范式之间的竞争与转换。当前我国高度重视的未来产业恰恰处在新技术范式孕育形成的阶段，主导技术体系尚未完全确立，多条技术路线同时探索具有客观必然性。例如，作为数字生命研究的支撑技术，脑机接口领域已形成侵入式、半侵入式、非侵入式多条技术路线并进的发展格局。

哪一条技术路线能最终占据主导地位，不完全由实验室指标决定。某一技术一旦通过规模化应用取得先发优势，围绕其形成的生产设备、技术标准、专业人才、供应体系 and 用户基础就会相互支撑，学习效应和规模效应会进一步强化这一技术路线，形成路径依赖甚至锁定。由此看，既不能把短期的技术领先简单等同于长期的产业优势，也不能在信息不足时过早把资源集中到单一路线。作出战略预判的要义，是在国家战略目标相对明确、具体技术路线仍存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对不同技术路线的发展潜力、成熟程度、支撑条件和转换风险作出持续动态判断，并根据新的科研进展和产业实践及时调整。

可见，提升前沿技术战略预判能力，归根到底是提高遵循科技创新规律和产业发展规律进行决策的能力。战略预判不是预测哪项技术一定能成功，也不是编制一份长期不变的技术目录，而是在不确定条件下更好把握技术发展的方向和节奏。即哪些领域关系长远发展，需提前布局；哪些技术仍处于早期探索阶段，应保留更多可能性；哪些路线已进入工程化验证阶段，可通过真实场景比较性能 and 成本；哪些技术逐步成

熟，可以更多交由市场选择。通过战略预判，把技术发展阶段看清楚，才能有效提高政策支持的针对性、有效性。

技术预测预见关系未来产业

未来产业培育周期长、技术变化快，从基础研究形成突破到应用技术开发、工程化验证，再到产品定型和规模化应用，需要跨越多个阶段。技术在不同阶段要解决的问题不同，早期探索阶段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原理能否成立、技术能否实现，进入工程化阶段后需解决技术可靠性、成本以及配套问题，走向产业化后则要接受市场需求、商业模式和竞争规则的检验。在此背景下，提升前沿技术战略预判能力就非常重要，能够把技术所处发展阶段和政策作用方式结合起来，避免用同一种政策支持不同成熟程度的技术。

这有助于把握未来产业布局的时机。布局过晚，可能错过基础能力积累和产业规则形成的重要阶段；布局过早、投入过度，又可能在技术尚未被充分验证的情况下开展大规模建设。特别是在未来产业受到广泛关注的情况下，如果缺乏对技术成熟度和产业化条件的判断，就容易出现各地围绕相似领域重复布局。真正有价值的多路线探索，是不同技术原理、不同工程方案之间的竞争，而不是相同技术路线在不同地区的简单复制。

这有助于提高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前沿技术研发具有高风险、长周期和较强知识外溢等特征，一些重大科研设施、基础共性技术具有明显的公共产品属性，单一企业往往缺乏独立承担的能力和动力，需要国家保持战略投入。但进入工程化验证阶段和市场应用后，技术路线的优劣就越来越取决于成本、质量、可靠性和用户选择。进行战略预判的重要价值，也体现为既能使有限资源可以支持技术的长期积累，又能通过竞争发现更有效的技术方案。

这有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前沿技术的战略价值不能只看论文、专利和实验

室指标，还要看能否形成稳定的工程能力和产业能力。需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用，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只有把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企业和用户家的判断结合起来，才能及时发现一项技术从“可行”走向“可用”、从“可用”走向“好用”所面临的真实约束。

找准不同阶段政策需求

我国已形成较为完整的科技创新规划、重大任务部署和前沿技术预测预见相关体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已经开展重大非共识项目试点，开辟专门渠道遴选和资助意义重大、争议性大、风险性高的原创性、颠覆性研究工作。这些都说明，对于前沿技术领域，既要形成方向性判断，也要为其他技术路线的研究保留探索空间。

技术发展在不同阶段对政策的需求并不相同。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实践表明，在技术形成早期，政策重点应更多放在基础研究、原始创新和共性能力建设上；关键技术逐步突破后，需通过中试验证和应用场景帮助技术发现问题、加快迭代；进入产业化应用阶段，则应更多依靠公平竞争形成优胜劣汰，同时完善标准、监管和市场环境。智能交通等领域的发展过程表明，研发支持、示范应用和产业规划等政策工具并非彼此割裂，而是随着技术成熟度变化转换侧重点。需要通过战略预判识别这种阶段性变化，更好服务政策决策。

当前，尤其要防止前沿技术预测预见静态化。制定技术清单有助于集中研究力量，但清单反映的是一定时期内对技术发展的认识，不等于对未来结果作出确定判断。技术条件和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原来处于优势的技术路线可能遭遇新的约束，原来并不突出的方案也可能因关键环节突破而快速推进。如果项目进入清单后长期固化，就容易形成政策资源围绕既有路径自我强化，削弱发现新路径的能力。因此，技术预测预见应当保持开放性，需完善持续跟踪、阶段评估和动态调整机制。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提升前沿技术战略预判能力，必须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对于关系国家长远发展、基础性和外溢性强、投资周期长的技术方向，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用，加强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供给，为企业利用重大科研设施 and 开展中试验证提供条件。战略预判主要解决方向性、基础性和公共性问题，为多个具备可能性的技术路线提供探索条件，而不是提前代替代科研主体和经营主体作出具体技术选择。

对于技术方案较多、产业需求较为明确、能够通过产品和服务比较优劣的领域，需更多发挥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和市场发现功能。企业最接近生产现场和用户需求，能够判断技术是否可靠、成本能否下降、商业模式能否成立。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产业体系提供了丰富应用场景，应通过公平开放场景、畅通要素流动和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让不同技术路线在真实需求中接受检验。用好“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的合力，还需与技术发展阶段联系起来。技术越靠近基础研究、越具有共性能力，政府就越需要承担长期投入和组织协调责任；技术越接近产品化和规模化应用，市场选择和企业决策越需发挥更大作用。国家支持的重大技术方向，应允许不同科研团队和企业提出不同实现方案；主要依靠市场探索的技术，也需要政府提供基础制度、公共平台和公平竞争环境。在提升前沿技术战略预判能力过程中，不能单纯地在政府与市场之间二选一，而是要根据技术成熟度、战略重要性等调整两者的作用方式。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